

元修辞学:洛特曼修辞学的逻辑延伸*

刘宇红 赵富春

摘要 洛特曼符号学包含了对修辞学的较多探索,但是“元修辞学”只是被一带而过,没有做较深入的探讨,留给后人较多的理论创新空间。元修辞可以分为解释性元修辞和构成性元修辞。与元修辞现象并存的是对于修辞现象的元修辞理解策略,元修辞理解策略证明了元修辞现象的心理现实性,元修辞现象支撑了元修辞理解策略。

关键词 洛特曼 元修辞学 隐喻 转喻

DOI:10.16238/j.cnki.rla.2016.02.020

Meta-Rhetorics : A Logical Extension of Lotman ' s Rhetorics

Liu Yuhong Zhao Fuchun

Abstract Lotman ' s semiotics consists of abundant researches into rhetorics but meta-rhetorics was scarcely touched upon, which leaves much space for late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Meta-rhetorics is comprised of explanatory meta-rhetoric and constitutive meta-rhetoric. Co-existing with meta-rhetorical usages are meta-rhetorical strategies in interpreting rhetoric, the former bases the latter on instances while the latter proves the former ' s psychological reality.

Keywords Lotman ; meta-rhetorics ; metaphor ; metonymy

一、导论

俄罗斯符号学家洛特曼^[1]梳理了艾科、比利时列日林小组的修辞学研究以及新修辞学的辞格概念。洛特曼将修辞学的强大生命力归结于它始终关注的对象——文本生成活动,其中心是辞格修辞学。洛特曼从人的意识特点入手,剖析了文本的生成机制,认为人的意识是“异质的”,在个人意识或集体意识中隐藏着两种文本制造者:一种文本制造者基于不连续的机制,运用不连续的编码系统,构建出由连接“节”(segment)组成的线性链接的文本,其中意义的主要载体是节或符号,而节的线性链接(文本)是第二位的,文本的意义由符号的意义而来:另外一种文本制造者则基于连续的机制,此时文本是第一位的,它是意义的载体,其本质是连续的,它的意义充满

着该文本的n个语义空间(如油画布、舞台、银幕、仪式、社会行为或者梦境)。尽管两种机制的构造不同,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不断的文本和信息交换,这种交换以语义翻译的形式完成。^[2]

洛特曼以隐喻和转喻为切入点,对修辞格的类型本质与功能本质进行了文化学研究。洛特曼认为,在总结不同修辞风格时期(神话世纪、中世纪、巴洛克、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先锋主义等)篇章构成结构的语义原则基础上,可以确定辞格的类型本质。^[2]这些不同修辞风格中的语义单位可以互相替换,相互

* 本文是教育部课题(编号13YJA74003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课题(编号NR2012014)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优势学科代码:20140901)的阶段性成果。

替换的单位在语义和文化参数上有差异,具有不兼容的矛盾特性,在一个传统的文化背景内它们在同—个文本中绝对不可能同时出现。被替换者与替换者不是简单的语义变换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原则上新颖的、离奇的语义情景,构成了辞格特有的语义效果。文化以类型的方式青睐于语义辞格并非偶然,洛特曼以圣像和圣遗物为例进行了说明。圣像是非物质的、不可表达的神学本质的物质表达符号,因此在符号学意义上它被认为是隐喻。圣像的隐喻作用来自两种能量的碰撞:宗教逻各斯(logos)的能量(圣像令人顶礼膜拜)以及画家本人精神生活的能量。而圣遗物是圣人身体的一部分或者直接与其有关的东西,圣遗物就是转喻。圣像的修辞性质表现在:起到隐喻作用的不是随便一个形象,而是与绘画法则(比如固化了的结构、色彩等艺术手法)相适应的形象。这样,在隐喻表达和隐喻内容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复杂的、不平等的、多义性的关系,排除了纯理性的相互替换。^{[1](173)}

洛特曼认为修辞学属于科学意识,而科学意识领域包括修辞与逻辑两个层面。修辞层面“属于近似、类比和模拟领域,在这一层面提出新思想,建立意想不到、看似谬误的公理与假想”。在逻辑层面上,先前“提出的假设要经过检验,推导出结论,消除论证与推理过程中的内部矛盾”。^{[1](176)}我们知道“或然性”是西方古典修辞学的基础,演讲人在借助“逻各斯”说服听众时常常使用修辞式推论,其前提大多属于人类行为范围内或然性的事情,是“通常”会发生、很少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是在某些人看来真实可靠的推理,或者有某种程度真实性的事理,或者在多数情况下真实可靠的事理,它推出的是“或然式的证明”。鉴于或然式修辞推论与人类新思想产生的关系如此密切,洛特曼认为有必要在修辞层面构建元修辞学的语言(meta-rhetoric),以便于科学描写。但是对于元修辞学的理念如何落实?它的逻辑运行机制如何?在科学描写中如何起作用?这些问题在洛特曼的著作中找不到答案。所以,

我们循着洛特曼的思路,在现代认知修辞学的逻辑框架下,对洛特曼想做而没有做到的理论建构做出尝试。

二、元修辞与修辞的关系

元修辞(meta-rhetoric)是基于“元语言”(meta-language)的类比造词。元语言是指讨论或研究语言本身时所使用的语言,被讨论或研究的语言称为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同样,当修辞的修辞对象是修辞本身时,这样的修辞就是元修辞(meta-rhetoric),被修辞的修辞是目标修辞(target rhetoric)。

举例来说,我们说“A是B”(如“人生是旅行”)或用B来指称A时,B是隐喻用法(metaphor),如果说“A是隐喻”或者用“隐喻”来指称A时,“隐喻”不只是修辞,而且是目标修辞,因为它本身成为被隐喻的隐喻。对“隐喻”进行隐喻解读的是元隐喻,是元修辞的一种。

元修辞和目标修辞在类型上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如元修辞是隐喻(元隐喻),目标修辞也是隐喻,或者元修辞是隐喻,目标修辞是转喻(metonymy),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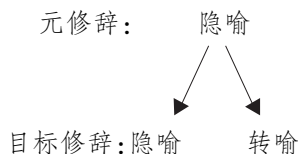


图1 元修辞与目标修辞的两种关系

三、元修辞的功能分类

修辞和元修辞具有相同的功能类型。举例来说,隐喻可以分为解释性隐喻(explanatory metaphor)和构成性隐喻(constitutive metaphor)。所谓解释性隐喻,是对抽象概念的解释,即用较具体的概念来解释较抽象的概念,如用“旅行”来解释“人生”。所谓“构成性隐喻”是指隐喻本身构

成抽象概念,离开这样的隐喻,抽象概念就不存在,或者没办法被谈论,比如,我们在谈论电脑时,会使用“桌面”、“窗口”、“文件(夹)”、“回收站”、“病毒”等隐喻,离开了这些隐喻,我们就没办法谈论电脑和有关电脑的操作。

同样,元修辞也分为解释性元修辞(explanatory meta-rhetoric)和构成性元修辞(constitutive meta-rhetoric),下面我们依次来介绍这两类元修辞。

(一)解释性元修辞

我们以雅柯布森的理论阐释为例,来说明解释性元修辞在科学理论中的应用。

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1891—1982)是20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家之一。雅柯布森在研究失语症(aphasia)时发现了两种类型:相似性紊乱失语症和邻近性紊乱失语症。对某特定概念来说,前一种失语症的患者无法回忆起与之相似的概念,比如对“盘子”这个词,这类患者无法联想到“碟子”、“碗”等概念,但是可以说出这样的话语,如“用盘子盛菜”、“用碗吃饭”等等。对后一种患者来说,情况恰好相反:患者可以说出同一类的词,但缺乏组词成句的能力。

基于这种观察,雅柯布森^{[3](90)}得出结论,“语篇的展开沿两条语义轴线推行,从一个主题进入到另一个主题要么通过主题间的相似性(similarity),要么通过主题间的邻近性(contiguity)。”“隐喻是对前一种情形最恰当的概括,转喻是对后一种情形最恰当的概括,因为两者分别体现了隐喻和转喻最简约的用法”,^{[3](90)}在失语症中,“隐喻或转喻部分受限或完全阻隔”。^{[3](90)}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解释性元修辞如何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失语症的症状。

雅柯布森把某种语言能力类比为隐喻,这种类比方法就是元隐喻,因为被类比的“隐喻”是目标隐喻。目标隐喻包含我们关于隐喻的知识(请注意,在雅柯布森提出上述观点的时候,认知隐喻理论还没有问世),

如它涉及两个概念,即本体和喻体,本体和喻体具有某方面的相似性,相似性的映射过程(在图2中用虚线箭头表示,下同)是隐喻的解读过程。元隐喻同样包含本体和喻体,同样涉及两者间的相似性映射。元隐喻的解读结果是目标隐喻的结构和相似性向“某语言能力”映射,包括三个方面:目标隐喻的喻体和本体分别向当前概念“盘子”和它的联想概念“碟子/碗”映射,而且,目标隐喻的映射关系本身也是映射内容,如图2中的三个曲线箭头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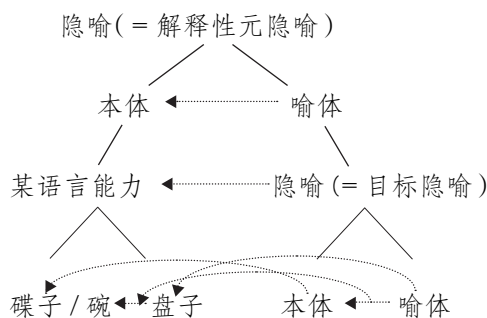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目标隐喻的元隐喻

元隐喻区别于目标隐喻的地方,在于目标隐喻的映射内容是特定的概念知识,比如在“人生是旅行”中,旅行者映射为人生的主体,旅行中的导游是人生的导师,旅行中的障碍是人生的困难,等等。在元隐喻中,映射的内容是关于“隐喻”本身(即目标隐喻)的知识,即隐喻涉及喻体和本体,而且两者间具有相似性映射。这种对比恰如“(目标)语言”与“元语言”之间的关系:(目标)语言以客观世界和人类的内心世界作为指称和谈论的对象,而元语言以(目标)语言本身作为指称和谈论的对象。

在上例中,元隐喻的映射结果是听者(或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某语言能力”,以及丧失这种语言能力所导致的失语症的症状,这正是解释性元隐喻的“解释”效果。

雅柯布森的表述中还涉及另一种元修辞,即目标修辞是转喻的元隐喻,也就是说,转喻成为了“目标转喻”。目标转喻体现借代者与被借代者在概念上的相邻关系,这种相邻

关系成为了元隐喻映射的内容,如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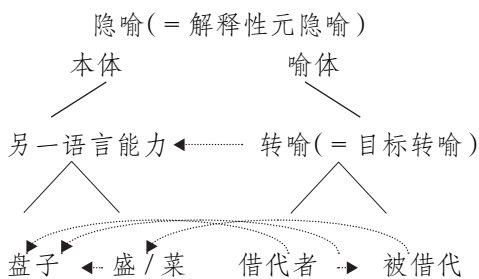


图3 基于目标转喻的元隐喻

在图3中,目标转喻是借代关系,元隐喻是相似关系。目标转喻的借代者、被借代者以及借代关系通过元隐喻的相似关系映射作用于“另一语言能力”,用于理解“盘子”、“盛”、“菜”之间的相邻关系,以及“另一种语言能力”丧失所对应的失语症的症状。

运用元修辞来解释自己的学术主张的学者,还有法国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

拉康在弗洛伊德析梦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梦的工作方式包括凝缩(condensation)和移置(displacement)。凝缩即多种隐义通过一种象征暗示出来,这样梦中的意象比较简单,好像是隐义的一种压缩体似的,所以他说的凝缩就是隐喻,因为隐喻就是这样压缩的:比如我们说“张三是一头猪”时,“笨、懒、贪吃、不讲卫生”等隐义被压缩到了喻体“猪”之中。移置是指通过意象材料的删略、变更或重新组合,用无关的或不重要的情景替代隐义。移置就是转喻,比如我们用“手”来指代做为劳动力的人是转喻,因为我们关心的并不是“手”,而是手能够创造价值的价值。

对凝缩和移置的元修辞理解,分别对应图2和图3,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不再赘述。

(二) 构成性元修辞

系统功能语法在谈论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实现为词汇语法形式(lexico-grammatical form)时,提出了语法隐喻(grammaral metaphor^{[4] [321]})。语法隐喻基于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5] [6]}),是以

“概念隐喻”为目标隐喻的元隐喻。

“语法隐喻”之所以能成为“概念隐喻”的元修辞,是因为两者都涉及意义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都涉及相似性和基于相似性的比较,不同的是视角上的差别,即“从上到下”(top-down view)与“从下到上”(bottom-up view)的视角差别。

概念隐喻是一种形式对应两种意义:一种是字面义,另一种是隐喻义,比如“猪”有两种意义,字面义指某种被称作“猪”的动物,隐喻义是“愚蠢的人”或“贪吃、贪睡、不讲卫生的人”,所以概念隐喻是从下到上的视角,即从形式出发来理解意义,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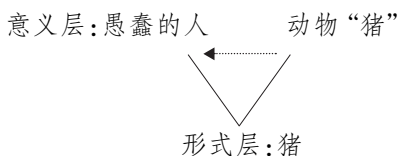


图4 概念隐喻:从下到上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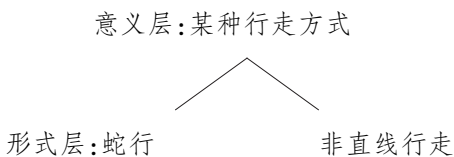


图5 语法隐喻:从上到下的视角

语法隐喻是从上到下的视角,比如要表达某种非直线的行走方式,可以使用“非直线行走”,也可以说“蛇行”(即像蛇那样爬行),如图5。“字面表达”和“语法隐喻”之间没有表示映射的箭头,因为“非直线行走”和“蛇行”之间没有映射关系,也没有时序上的先后关系,即很难确定哪一种影响或决定了另一种。

“非直线行走”和“蛇行”也可以分别称为一致式与非一致式(congruence vs. incongruence),但是这种说法似乎有一种错误暗示,即一致式是合理的(因为它是无标记的),而非一致式是较不合理的(因为它是有标记的),违背了系统功能语

法认为词汇语法形式没有优劣之分的观点，^{[4] (321) [7] (222)}事实上，某些非一致式可以更符合本族语者的语感和表达习惯，至少“蛇行”比“非直线行走”更通俗、更容易上口，所以，字面义与隐喻义(literal vs. metaphorical)就成了更合理的术语。从这个意义上讲，“语法隐喻”就是构成性元修辞(constitutive meta-rhetoric)，因为除了“语法隐喻”这个隐喻，作为字面表达式的“非一致式”并不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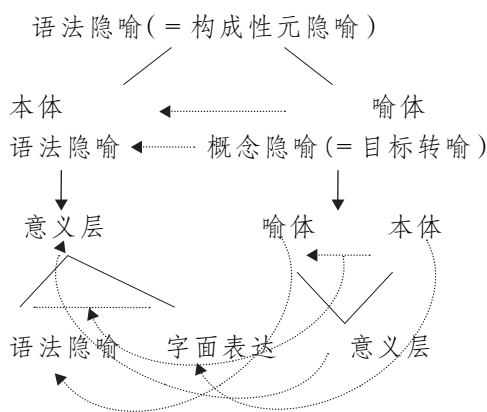


图6 构成性元隐喻

图6包含了图4和图5。图6的空心箭头分别指示概念隐喻和语法隐喻，曲线箭头所表示的映射内容体现“从上到下”与“从下到上”的差别。而且，从图6可以看出，“语法隐喻”之所以是“构成性元隐喻”，是因为它的本体就是“语法隐喻”，而且与“字面表达”对应的也是“语法隐喻”，请注意图6中有三处使用“语法隐喻”，这就是“构成性”特征的体现。

四、修辞理解过程中的元修辞策略

元修辞现象，不仅存在于修辞的使用上，在修辞的理解过程中，也有学者提出了元修辞的解读策略。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在目标隐喻和目标转喻的理解过程中，可以采用元转喻(meta-metonymy)的策略。

为了理解什么是元转喻，我们先回顾一

下什么是转喻。布兰克(Blank)^{[8] (174)}把转喻关系分为三类：

(1)同一框架(frame)内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比如praeco在拉丁语中指“信使”，而在古西班牙语和古葡萄牙语中指“消息”。“信使”是带来“消息”的人，所以两者在同一框架里：

(2)概念与上级框架(superordinate frame)之间的关系，比如travail在古法语中指“疼痛”，在中古法语中指“工作”，到了现代英语中演变为travel，指“旅游”。“疼痛”、“工作”、“旅游”都是“很难受或很累的事情”，后者是上级框架：

(3)相关框架之间的关系，比如disner在古法语中指“吃早饭”，而在现代法语中指“吃中饭”。“吃早饭”和“吃中饭”虽不相同，但是两者是相关的框架。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隐喻和转喻理解中的元转喻策略。

举例来说，My job is a jail(我的工作像坐牢)是隐喻，它把“工作”隐喻成为“坐牢”。格拉克堡与奇萨(Glucksborg & Keysar)^[9]认为，jail激活了一个临时范畴，即“令人不悦的、让人受困的事情”，在这个临时范畴中，“工作”和“坐牢”都是它的范畴成员，其中“坐牢”是典型的成员，“工作”是较不典型的成员，通过把“工作”纳入到临时范畴中，“工作”获得了说话人所期待的解读，即“工作”令人不悦而且让人受困。这种解读策略与布兰克^{[8] (174)}提出的第二种转喻类型相同(见本节上文)，体现的是概念与上级框架之间的关系，因为“令人不悦的、让人受困的事情”是一个上级范畴(请注意，“范畴”与“框架”是同义语，其差别暂时可以忽略)。在这一过程中，解释过程采用的是转喻方法，我们称之为“元转喻”策略，被解释的对象是隐喻，我们称之为“目标隐喻”。

这种观点在对Argument is war(辩论是战争)的分析中也得到了体现，^{[10] (35)}两位学者认为，战争中的攻击行为(attack)是敌对和不友好的典型做法，口头争辩和战场

上的进攻通过同一个框架(即上级框架)联系在一起,这个框架包括了两个下级框架,即“实质性的攻击”和“口头上的攻击”,这种观点与布兰克提出的第二种转喻类型(见本节上文)也是一致的,^{[8] (174)}体现了“元转喻”与“目标隐喻”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看看另一种元转喻策略。比如, John is a Judas (约翰是犹大)本身是转喻,是用犹大(Judas)这个“人名”来借代 Judas 所具备的“特征”,属于布兰克^{[8] (174)}所提出的第一种转喻类型(见本节上文),因为“人名”与“特征”在同一个框架里。在对 John is a Judas 的解读过程中,元转喻策略同样适用,即采用^{[8] (174)}所提出的第二种转喻类型作为元转喻策略:通过 Judas 激活它的上级范畴“背叛者”,在这一上级框架中, Judas 是公认的属于“背叛者”的典型成员,而 John 是说话人所认可的成员。这一理解策略同样是元转喻性质的,是用元转喻来解读目标转喻。

五、结语

元修辞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在洛特曼的符号修辞体系中,元修辞学也只是略带提及,而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也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和修辞学界的注意。对元修辞现象的研究,不仅可以拓展洛特曼修辞学的理论内涵,探讨从修辞到元修辞的逻辑必然和内在规律,还可以把作为语言现象的元修辞现象和修辞理解过程中的元修辞策略进行理论上的整合,既可以证明元修辞使用现象的心理现实性,也可以为元修辞策略的合理性找到语言实例上的支持。在学科交叉融

合成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的大前提下,总结哲学、美学、语言学、修辞学、符号学等学科之间的理论共性,发现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之间的借鉴关系,对于理解相关学科的理论要点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Лотман Ю. М. Статьи по семиотике и топологии культуры.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в трех томах [M], Таллин, Александра. 1992.
- [2] 樊明明:洛特曼修辞学思想初探 [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 [3] Jakobson, R. 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 [J]//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1956, 55.
- [4]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 [5]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 [6] 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J]//Metaphor and thought, 1993 (2).
- [7] 朱永生、严世清、苗兴伟:功能语言学导论 [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8] Blank A. Co-presence and succession : A cognitive typology of metonymy [C]//In Klaus-Uwe Panther and Günter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 J. Benjamins. 1999: 169-191.
- [9] Glucksberg, S. & Keysar, B. Understanding metaphorical comparisons : Beyond similarity [J]//Psychological review, 1990, 97 (1).
- [10] Radden, G. & Kövecses, Z.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J]//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1999 (4).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